

汉代《孟子》“传记博士”考论

——兼论孟子其人其书在两汉的学术地位

李峻岫

(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 北京 100871)

摘要: 关于汉文帝时《孟子》立传记博士之事,《史》、《汉》无明文,前人争论颇多。汉初之博士制度沿袭秦制,广立诸子而限于五经,故《孟子》以诸子书而得立博士当在情理之中,且《孟子》尊立博士亦有汉代相关著述及记载作为佐证。《孟子》传记博士之罢黜,史籍无载,当在董仲舒对策,提出罢黜百家之后。《孟子》“传记博士”之名未必是文帝时的称号,可能是后人追称。《孟子》被称为传在西汉文献中难以见到,基本只见于东汉乃至魏晋六朝时期的著作。较之西汉,东汉《孟子》的学术地位和受重视程度有所提升,孔孟并称已成为一些学者的共识。

关键词: 孟子; 汉代; 传记博士; 学术地位

中图分类号: B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22X(2007)01-0023-05

汉兴之后,除秦挟书之令,广收篇籍。至汉文帝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1]《楚元王传附刘歆传》。东汉赵岐《孟子题辞》云:“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2]《P17》据此,则《孟子》在汉文帝时曾立于学官,号为传记博士。博士之立,起于六国。^①秦因之,立博士之官。《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李斯焚书之议曰:“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是秦博士所掌除《诗》、《书》外尚有诸子百家学。据王国维考证,秦时“诸子、诗赋、术数、方伎皆立博士,非徒六艺而已”^[3]《P105》。汉承秦制,武帝置五经博士之前的博士制度当近于秦。《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云:“博

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吕思勉《读史札记》指出,“班《表》之说,盖谓汉之博士,沿袭嬴秦,原不谓博士之官,为秦人所创置也”^[4]《P40》。其说是。汉文帝时博士官所掌,尚未仅限于经学。当时五经中只立《诗》博士。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说》云:“后汉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经博士。’考之汉史,文帝时,申公、韩婴皆以《诗》为博士。五经列于学官者,唯《诗》而已。”^②他则多因诸子学而立。如贾谊,以“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5]《屈原贾生列传》,公孙臣以终始五德说而召为博士^[5]《孝文本纪》。又,据《汉官仪》、《汉旧仪》所载,汉文时立博士七十余人^③。《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又载卢生曰:“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是

收稿日期: 2006-09-10

作者简介: 李峻岫(1977—)女,山东潍坊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助理研究员。

- ① 沈约《宋书·百官志》云:“六国时往往有博士,掌通古今。”关于战国秦汉博士制度可参看胡秉虔《汉西京博士考》张金吾:《两汉五经博士考》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7年版;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观堂集林》卷四《艺林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周予同《博士制度和秦汉政治》《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② 罗义俊有《汉文帝置三经博士》(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1辑)认为文帝时除《诗》置博士外,可考见者又有《书》、《礼》二博士。但所引资料均未能证其所云《书》、《礼》博士为汉文时博士。辨见曹金华《汉文帝置经博士考》《江海学刊》1994年第4期。
- ③ 《唐六典》卷二“国子博士”条引应劭《汉官仪》曰:“文帝博士七十余人,为待诏。”中华书局1992年版, P59 《艺文类聚》卷四“职官部”二“博士”条引卫宏《汉旧仪》曰:“孝文皇帝时,博士七十余人,朝服玄端,章甫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P831

汉文时无论博士员数还是博士职掌,皆近于秦制。根据刘歆所说,其时诸子传说“广立于学官”,当不限于赵岐所云《论》、《孟》等儒家子书。《孟子》以诸子之书而得立博士,衡之以秦汉之际的博士制度,亦在情理之中。但其立为传记博士之说《史》、《汉》无明文,以致后人疑其为赵岐臆说。如皮锡瑞《经学历史》曰:“《史记》、《汉书》、《儒林传》皆云:‘文帝好刑名,博士具官未有进者。’既云具官,岂复增置;五经未备,何及传记。汉人皆无此说,惟刘歆《移博士书》有孝文时诸子传说立于学官之语。赵氏此说当即本于刘歆,恐非实录。”^[6] (P32)按,皮氏以为当先立五经,方可及于传记之说,实以汉武帝后之尊经思想和博士设置来方度汉初史实。汉文时尚未有汉武以来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举措,如前文所述,其博士制度仍沿秦制,博士所掌亦不限于经。清胡秉虔尝言,“汉承秦后,仍立博士之官,武帝以前,但取通古今、备顾问而已。故或兼立传记,而五经反不全”^[7] (P5),其说是。又,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乃是公开的辩论性著作,其“所举史实若与当时官方文献不合,必陷窘境”^[8] (P557),因此其说的正确性应是可信的。刘说正可与赵说相印证。阎若璩《四书释地·三续》“孟子置博士”条云:“愚谓《汉书》固有是说,但未见《儒林传》。不观刘歆《移书太常博士》乎?书云:‘孝文世《尚书》初出于屋壁,《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诸子传说即《孟子》等书也。后罢之则以董仲舒对策,专崇六艺云。”

此外,《孟子》立博士一事在汉初尚有其他表征可为佐证。《史记·封禅书》曰:“(文帝)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礼记·王制》题下孔颖达疏引卢植语,亦云:“汉孝文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王制》之书。”^[9] (P1321)汉代学者普遍认为《王制》晚出,而《王制》中所言制度又多与《孟子》相合。如郑玄《答临硕》云:“孟子当赧王之际,《王制》之作,复在其后。”^[9] (P1321)郑玄独以《孟子》与《王制》相较,“殆因《孟子》与《王制》相通,故举以比拟;更谓《孟子》时代更早,《王制》之作

在后,其说亦然”^[10] (P108)。焦循《孟子正义》云:“今《王制》篇中,制禄爵关市等文,多取诸《孟子》,则孝文时立《孟子》审矣。”^[2] (P17)是《王制》多采据《孟子》。金德建先生将《孟子》、《王制》二书详加检校,指出《王制》中所述制度采据《孟子》多至三十四条^[10] (P94-101)。盖因《王制》成于孝文时众博士之手,其时《孟子》亦置学官,博士中必有熟稔且尊崇《孟子》者,故于《王制》中多采择其说。又,文帝时《诗》博士韩婴所撰《韩诗外传》中引《荀子》多次,其深受荀子影响毋庸置疑,以致汪中云其乃“荀卿子之别子”^[11],但《韩诗》卷四第二十二章在袭取《荀子》“非十二子”之论时,却只“非十子”,删非子思、孟子之文,此亦可证当时《孟子》受尊崇之事。金德建先生谓:“当文帝时,孟子之学,曾立博士;文帝又使博士诸生纂集《王制》,所述制度,亦以采据孟子之说为多。可征孟子之学,其时极盛,方为博士辈所崇尚,则韩婴既为文帝博士之一,安得反加以非毁乎?故举荀卿非子思、孟轲语,遂摒而不录矣。”^[10] (P54)杨海文先生指出,这一方面表明“韩婴在主观上是努力维护孟子的思想权威的”,另一方面也表明“这种思想权威在某种程度上又源于《孟子》厕身传记博士这一客观事实”^[12] (P3),此说不为无见。

传记博士罢于何时,赵岐未明言,史籍亦无载。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九《答问》六《论语》论罢传记博士之时曰:“《汉书》赞武帝云:‘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以本纪考之,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则传记博士之罢当在其时矣。”认为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的同时即罢传记博士。后之学者多沿袭钱说^①,但此说未予论证,实有可商之处。《汉书·武帝纪》只云武帝置五经博士,并未言及罢黜传记博士之事,故不能排除传记博士与五经博士并行之可能。史载,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5] (《封禅书》),武帝即位初年之朝政颇受其掌控。建元元年王臧、赵绾等人的儒学改制运动即因窦太后反对而失败。^② 窦氏卒于建元六年,其后,推尊儒术的田蚡才得以为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5] (《儒林列传》)。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之时窦

① 见焦循:《孟子正义》卷一, P17 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观堂集林》卷四《艺林四》 P106 杨海文先生未作论证即以钱说为是,认为此说弥补了赵岐说的“两个不足”,实令人难以据信。见其《〈孟子〉传记博士的文化阐释》《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② 事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史记·封禅书》。又,《汉书·礼乐志》亦云:“至武帝即位,进用英隽,议立明堂,制礼服,以兴太平。会窦太后好黄老言,不说儒术,其事又废。后董仲舒对策言……”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对改制失败之因有详细分析,可参看,见其《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P207-212

太后尚在,若此时即罢黜诸子传记博士似不太可能。^①传记博士之罢当在董仲舒对策,提出罢黜百家之后,否则董说则为无的放矢。^②其《对策》云:“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董仲舒传》董仲舒对策之年《汉书·武帝纪》明系于元光元年,但《史记·武帝本纪》、《儒林列传》均未及此。《资治通鉴》据《史记》记载推测为建元元年,其他又有建元五年、元朔五年、元光五年等说,^③而尤以《汉书》、《通鉴》两说影响为大。周桂钿先生《秦汉思想史》第八章“对策之年考”一节比辑众说,多方考察,证明元光元年说之合理性胜于他说^[13](P122-132)。本文亦认为当仍从《汉书》之元光元年说。^④如此则传记博士之罢或在元光元年之后。

关于“传记博士”之称是否就是文帝时即有的说法,前人也有所质疑。汉人常常有“诸子传说”、“诸子传记”的说法,诸子往往等同于广义的传记。所谓传、说、记,皆为古书传授中的几种类型。《论衡·书解》曰:“圣人作其经,贤者造其传。述作者之意,采圣人之志,故经须传也。”又,皮锡瑞《经学历史》云:“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弟子展转相受谓之说。”^[9](P67)可见,传、说、记皆是解经翼经之作。如《孟》、《荀》中所引“传”即为先秦之《诗》传或《书》传,其他如大小戴所传之《记》以及郭店楚简之儒家简等等,意即孔门后学所传述的孔门经说,都属于传记的范畴。汉代,尤其是汉武帝之后,出于尊经的意识,将诸子也都视为解经之作,将其纳入广义的

传记范围内。如《汉书·景十三王传》云河间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中《礼记》、《孟子》包括《老子》显然都是归入“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一类的。但经与传记乃相对之名,所谓“依经而有传,对人而有我”^⑤。文帝时虽立《诗》博士,但尚未有“经学”或“五经”博士之名,因此“传记博士”之名也未必就是当时的称呼,很可能是后人追称。钱穆先生认为:“盖申公之侑其前为博士,乃以‘通古今’,非以其‘专经’。其时则诸子百家皆得为博士。至武帝尊隆儒术,乃称为‘《五经》博士’。而其他不以《五经》为博士者,遂见罢黜;后世因名之曰‘诸子传记博士’。其先皆以通古今,则不别《五经》与诸子传记也。”^[14](P198)其说可参。也有学者认为“传记博士”可能就是赵岐在“五经博士”之称极其流行情况下的提法,目的在于区分两类博士的不同^[12](P5)。亦可备一说。汉世通称《孟子》为传,这是学者一般的看法。翟灏《四书考异·总考二十·尊立孟子》云:“时《论语》、《孝经》通谓之传,而《孟子》亦以传称。”其后即列举了许多汉代文献中称《孟子》为传的例证。但仔细辨析这些文献,则会发现《孟子》被称为传基本只见于东汉乃至魏晋六朝时期的著作,包括《汉书》、《论衡》、《越绝书》、《说文》、《风俗通义》、《中论》、《后汉书》等等;西汉的著作中则难以见到《孟子》被称引为传的情况。如杂采前世传记而成的《韩诗外传》一书,其中“《传》曰”云云多采较古之《诗》传,其他则多见于《荀子》、《说苑》、《新序》等等。^⑥称引《孟子》时则径称“孟子曰”,并不称其为传。《盐铁论》中多处引《孟子》语,亦不称传,称引为传的

① 章权才先生认为当时武帝置五经博士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之一即是“置五经博士,并不意味着排斥别家,特别是排斥道家,这就无形中减少了阻力”。见章权才:《两汉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

② 徐复观先生以为,既已立五经博士,即是已经不使习诸子百家之言者得以并进,因此董仲舒上《对策》,发“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之言必在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之前(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P60)。其实如前所述,立五经博士并不意味着排斥诸子百家。立五经博士之后再罢传记博士,“勿使并进”,亦在情理之中。李景明《中国儒学史·秦汉卷》已指出这一点,见该书P105-106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③ 周桂钿《秦汉思想史》第八章“对策之年考”对各家之说有详细介绍,可参考。见其《秦汉思想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P122-132

④ 关于元光元年说的依据,尚可参看章权才:《两汉经学史》P88 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P213-217

⑤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内篇·经解上》《文史通义校注》(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P93 汉代以《论语》、《孝经》为传,而据《汉书·艺文志》所载,《鲁论》、《孝经》皆各有传,是《论语》、《孝经》对五经而言为传,对传《论语》、《孝经》者言,亦是经。参见吕思勉:《传、说、记》《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P686 夹注。

⑥ 《韩诗外传》中所称传的文字有六处同于《荀子》(其中有两处兼见于《大戴礼》/《孔子家语》和《说苑》《家语》),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韩诗》引述的传即是指《荀子》而可能是转述荀子之前更古的《诗》传。有学者指出,荀子不仅传授了儒家“经典”,而且也传授了儒家“传述”。荀子所传之“传”,主要集中在《礼记》和《韩诗外传》上。见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218-219

文字见于《老子》《礼记》《孝经》《公羊传》等。扬雄推尊孟子,但《法言》里也没有称《孟子》为传的痕迹。由此也可以进一步推断,所谓文帝时“传记博士”之称很可能确为后起,否则不应在西汉文献中难以见到称《孟子》为传的痕迹。即便为当时已有的称呼,其影响也应该非常有限。可以看出,西汉一朝《孟子》作为经“传”的地位尚未得到很好的确立。《孟子》与五经思想的关联及其作为经学辅翼的地位要到东汉才得到普遍的认可,而且这种视其为传的看法一直延续至魏晋六朝时期。赵岐《孟子提辞》云:“迄今诸经通义,得引《孟子》以明事,谓之博文。”^[2](P17)可见东汉学者以能在经学著述中征引《孟子》为荣,视之为博学的表现。不仅如此,东汉还出现了一批研究《孟子》的专著,有程曾、郑玄、赵岐、高诱、刘熙五家为《孟子》作注,桓灵时又有刘陶著《复孟轲》一书。可见较之西汉,东汉《孟子》的学术地位和受重视程度确实有所提升。^①

虽然汉代《孟子》隶属于广义的传记范围,但严格来讲,汉人还是将其置于诸子之列,其地位同《论语》《孝经》等经传又有所不同。王国维《汉魏博士考》在论及传记博士之罢时云:“然《论语》《孝经》《孟子》《尔雅》虽同时并罢,其罢之之意则不同。《孟子》以其为诸子而罢之也,至《论语》《孝经》则以受经与不受经者皆诵习之,不宜限于博士而罢之者也。”^[3](P106-107)这段话正道出了同列为传记博士的《孟子》和《论语》《孝经》其地位和意义之不同。《论语》《孝经》均为记载孔子言论的解经之作,又是当时学校的诵习之书,其地位之重要性可想而知。虽然罢废其博士设置,但实际上并未有所贬抑。而《孟子》则始终是属于诸子之列的,因而在推崇五经的前提下遭到了罢黜。班固《汉书·艺文志》(或者说刘歆《七略》^②)将《论语》《孝经》归入《六艺略》附于六经之后,而将《孟子》置于《诸子略》“儒家类”,正反映了汉人对《孟子》地位的一般认识。《孟子》的经学地位要迟至宋代才得以确立,这期间还要历经汉唐千余年的漫长的学术变迁和流行过程。

与《孟子》一书在汉代的学术地位相应,汉代学者在称述孟子其人时一般也是将其列为诸子,与荀子并称,而随着东汉《孟子》学术地位的日益提升,孔孟并称的说法则逐渐开始流行。最早明确以孟荀并称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中撰《孟子荀卿列传》《儒林列传》中亦将二人并提,云:“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认为孟荀均上承孔子之业。刘向也孟荀并尊,其《孙卿书录》云:“唯孟轲孙卿为能尊仲尼。”《战国策书录》亦云:“故孟子荀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15]东汉班固《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赞曰”亦将孟荀并提:“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杨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传曰:‘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岂近是乎?”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后序》云:“于是杨、墨、邹、孟、孙、韩之徒,各以所知著造传记,或以述古,或以明世。”将孟子与其他诸子并提。另外,西汉时也已出现孔孟并提的说法,如昭帝时的盐铁会议上大夫论曰:“孔子所以不用于世,而孟轲见贱于诸侯也。”^[16](卷五《相刺》)扬雄推尊孟子,认为孟子超出诸子之上,而不异于孔子。《法言·君子》云:“或曰:‘子小诸子,孟子非诸子乎?’曰:‘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也。孟子异乎?不异。’”至东汉,孔孟并提之说则日益多见。代表性的如王充《论衡》中屡次将孔孟并提^③。《论衡·逢遇篇》:“或以贤圣之臣,遭欲为治之君,而终有不遇,孔子、孟轲是也。孔子绝粮陈、蔡,孟轲困于齐、梁,非时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浅,不能用大才也。”《累害篇》:“乡原之人,行全无阙,非之无举,刺之无刺也。此又孔子之所罪,孟轲之所愆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损。盖孔子所以忧心,孟轲所以惆怅也”。《偶会篇》又云:“故孔子称命,不怨公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仓,诚知时命当自然也。”《命禄篇》谓“孔子圣人,孟子贤者”。王充称孟子为“贤圣之臣”和“贤者”,而仅称荀子为“通览之人”^[17](《别通篇》)。按诸王充对读书人所分等级,通人是不能与贤人比肩的,其扬孟抑

① 关于东汉《孟子》的受重视情况及其原因,可参看董洪利:《孟子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P162-166

②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在西汉刘歆《七略》的基础上“删其要”而成(《汉书·艺文志序》),所以《艺文志》的归类实际上也代表了刘歆的观点。

③ 《论衡》中亦有孟荀并提者,但少见,只有一处,即《对作篇》:“或问曰:‘贤圣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党,下至荀、孟之徒,教训必作垂文。何也?’”但此处为仿时人之设问,且后文王充作答只言及孔子、墨子、孟子、韩非诸人,并未提及荀子,可见此“荀孟”之称不足以代表王充之意见。

荀之意已很明显。^①班固亦尝将孔孟并举,其《答宾戏》曰:“是以仲尼抗浮云之志,孟轲养浩然之气,彼岂乐为迂阔哉?道不可以贰也。”[18] (卷四五)马融《长笛赋》:“温直扰毅,孔孟之方也”[18] (卷一八),则径将孔孟并提。赵岐为《孟子》作注,在《孟子题辞》中称孟子为“命世亚圣之大才”,《孟子》一书为“大贤拟圣而作者”,“《论语》者,五经之鎔鑄,六艺之喉衿也。《孟子》之书,则而象之”[2] (P13-14)。其中“亚圣”、“拟圣”之“圣”即是指孔子。赵岐认为孟子的思想品格与孔子相类,其推重孟子,孔孟并称的意图显而易见。东汉出现了程曾、郑玄、高诱、刘熙、赵岐五家《孟子》注,而《荀子》则未有作注者,可见东汉学者对孟子的评价和重视程度已经逐渐超出荀子^②,孔孟并称虽未完全取代孟荀并提说,但已成为一些学者的共识。

参考文献:

[1]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2] 焦循. 孟子正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3] 王国维. 汉魏博士考[A]. 观堂集林[C].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4] 吕思勉读史札记[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5]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6] 皮锡瑞. 经学历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7] 胡秉虔. 汉西京博士考[M]. 上海: 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1936
 [8] 姜广辉. 中国经学思想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9] 孔颖达. 礼记正义[M]. 北京: 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 1980
 [10] 金德建. 古籍丛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上海: 上海书店, 1986
 [11] 汪中. 荀卿子通论[A]. 述学·补遗[C]. 北京: 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 1991.
 [12] 杨海文. 《孟子》传记博士的文化阐释[J].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 1996(4).
 [13] 周桂钿. 秦汉思想史[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
 [14] 钱穆. 两汉博士家法考[A].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15] 姚振宗. 七略别录佚文[A]. 续修四库全书: 第916册[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16] 王利器. 盐铁论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17] 黄晖. 论衡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18] 萧统. 文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责任编辑: 李观澜

Research on “Zhuanji Po-shih” of the Mencius in the Han Dynasty
 —— Involving the Academic Position of Mencius and His book in the Han Dynasty

Li Jun-xu

(Compilation Center of RuZa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t has long been argued that the Mencius was officially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studies of the Po-shih in early Han. This article has a detailed study on some questions such as the establishment and abolishment of “Zhuanji Po-shih” of the Mencius when the designation of “Zhuanji Po-shih” was first used as well as the academic position of Mencius and his book in the Han Dynasty

Key words: Mencius; the Han Dynasty; Zhuanji Po-shih; position

① 马积高《荀学源流》中于此有所辨明,可参看。见马积高:《荀学源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版, P213

② 马积高先生认为,汉代尤其是东汉,孟子的影响实较荀子为大,并从三个方面作了论证。参看马积高:《荀学源流》P214-215